

专家观点

做好城市创新这篇大文章

■ 邓伟志

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目标明确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的今天,如何建设现代化城市值得重视和研究。会议把“创新”二字置于六大目标之首,要求“做好改革创新大文章”。下面笔者就创新型城市谈一点学习体会。

既要全面创新又要 有地方特色

笔者去过东西方数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有个突出的感觉是那些能够不断创新、跟着时代前进的老城市很有看头,灯火辉煌、热闹非凡,举目四望简直是在享受。然而有些没跟上时代步伐的城市只有考古价值,未必是宜居、宜业、宜学之地,深为它们感到惋惜。

创新型城市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一般体现在思想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机制体制创新、对外开放创新、企业管理创新和城市管理创新等方面。这表明城市不仅要实现要素高效聚合、制度精准适配、主体深度协同,还要超越传统的空间资源配置,推动创新孵化和动能转换。城市要发展,还必须在资源要素上互通、创新链产业链互融、基础设施互联。三个“互”字意味着在全面创新时,分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各个方面要注重协力共创。

早在20世纪,奥地利和英国的经济学家就先后提出“经济创新”“国家创新”的概念。可惜的是,西方为了创新,不同政党之间天天唇枪舌战、吵来吵去。因为不同政党代表不同阶层、不同界别的利益,他们的看法无不有部分的道理,但是难免孤立地看问题,难免说过头话。比如有些国家的某些政党认为核电有污染,就通过各种方法阻挠,导致核电项目取消或搁置,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还引发了社会矛盾,损害了地区形象。

我们不这样,多党合作、建言献策,没有国外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直言不讳地说,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在某些地方还是存在的。有些经济圈、合作区的各方,整体意识尚有欠缺。这多少阻碍和延缓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进程和速度。今后我们要注意打破区域壁垒,畅通要素流动,推动城市群与产业集群更好融合,让创新效能得到提升。

当然,提倡全面不等于“千城一面”,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文心雕龙》里有句话:“夫神思方远,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靠山吃山,还要会美化山的千岩竞秀;靠海吃海,也要学会美化

实践探索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三维路径

■ 游蛟 严国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一重大部署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的必然要求,是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实践抓手,目标是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努力保持适度人口规模,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生育是个体选择,也是家庭决策,更是国家大事,需要形成全社会参与、全人群覆盖、全周期保障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全社会参与,打造多元支持网络

以人民为中心的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建设。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有助于打造多元的支持网络体系,形成良好的政策、社会和家庭环境,进而提高育龄人群的生育预期,并促使其生育意愿有效转化为生育行为。

首先,要明确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形成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生育支持力量体系,重构生育成本在政府、家庭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分担机制。其次,要强化夫妻共担意识,充分发挥男性在生育友好型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提高男性在生育活动中的主动性有利于降低女性的生育焦虑、弱化就业市场中的“母职惩罚”现象、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因此,在生育支持和服务体系构建中,要强化男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做好改革创新大文章。一方面要在思想观念、发展模式、机制体制、管理方式的创新上下功夫。同时要找准自己的赛道,避免“千城一面”,既要有文化创新型城市、工业创新型城市,也要有服务创新型城市、科技创新型城市。另一方面还要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期盼,并以此来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要认识到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在城市建设中,为人才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

大海的波澜壮阔。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各有千秋。如果都集中在几条赛道上,各地不仅难以施展所长,还会造成资源浪费。真正的创新型城市一定有自己的特色,各有各的特色,才是“各美其美”。我们既要有文化创新型城市、工业创新型城市,也要有服务创新型城市、科技创新型城市,等等。“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重要的是完善制度创新

促进城市创新,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是制度设计。制度设计的前提是为谁设计。

2024年,三位美国学者因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对当地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证明了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他们三位都以他们的资本主义而自豪,认为制度决定生产力。但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不对的。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都是东西方公认的哲学家。试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搞资本主义呢?要怪只能怪生产力没发展到那一步。只有在蒸汽机发明以后,工业革命兴起以后,才出现资本主义。可见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制度。这个逻辑是不能颠倒的。但是,撇开这些,从他们三位重视制度设计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一点来看,尚有可取之处。

中国共产党是从“为民”起家的,是因为“为民”而取胜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创新型城市制度设计中的核心追求是“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创新城市的动力在人民的身上。

人民城市要创新首要的是“察民情”。“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创见生在民众之中。“风起于青萍之末”,有风吹草动群众首先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智慧的火焰是从大众心里发出来的。“察”,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察,走马观花不行,跑车观花更不行,要下马观花、下马栽花。只看一下还不行,要三顾茅庐。要注意

性参与的文化舆论氛围引导和激励机制设计。再次,要重视隔代照料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将其纳入制度性安排。受传统文化影响,多数老年群体和育龄群体对隔代照料这种抚育形式都具有较高的接受度。隔代照料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调动“银发”资源,缓解托育服务和儿童照料供需不匹配、养育教育成本较高等问题,促进家庭代际交流和增进社会福祉。最后,要充分形成和发挥多元主体“1+1>2”的合力,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适配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周期保障,阶段保护与长期福利并推

《决定》强调要“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人口发展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党中央科学研判,及时调整优化生育政策。同时,生育配套支持措施也在持续完善,生育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托育服务相关规范性文件和服务指南相继推出、产假普遍延长、生育津贴和育儿补贴初见成效。然而,现有的生育保障项目多集中在女性生产阶段,而实际的家庭生育决策已经包含对生育、养育和教育等各个阶段的成本效益分析。接下来,应围绕降低“三育”成本,探索建立覆盖全周期的生育福利制度体系。

健全完善生育环节当期各项支持和服务政策。着眼于生育环节的支持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科学合理地优化现有的制度安排。比如,对于

这里的“三”,是“多”的意思;要注意这里的“茅”,是茅草屋,不是五星级宾馆。不要满足于看见,要做到看穿、看透。要看热情,更要看民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被形式主义迷住眼睛,方能把“为人民”为到人民心里,把人民的需要化为城市创新的动力。

人民城市要创新必须听民声。要听悦耳的,也要听刺耳的,还要听出格的;要听幸福指数高的,也要了解人民的急难愁盼。80多年前在清涧县,毛泽东同志在听到农夫一骂后,派人调查征粮过重问题,及时纠正做法,并特别指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妄议是“妄”的,不好!但是,如果把异于己的当成妄议也不好。古人云“异端要研”,是有道理的。

人民城市要创新必须学会“汇民意”。了解了人民群众所盼,就要遵照人民群众所盼,来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从实际情况看,当务之急是改进分配制度。“公平”二字是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我们要做到“第一次分配”讲公平,“第二次分配”讲公平。在习惯和道德影响下的第三次分配,也要尽量做到公平,防止个别人为了捞个好名声,搞假捐献、乱捐款。一、二、三次分配都公平了,贫富差距才会缩小,基尼系数才会下降,城市的精神面貌也会焕然一新。

人民群众也有多样性,也是分阶层的。如何在城市创新中体现“人民城市为人民”,那就要求出最大公约数。这便是民主制度,是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和自由。

为了在城市创新中体现“人民城市为人民”,必须壮大社会组织。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有些城市已经做到了中青年人均参加四五个社团。社团的活动丰富多彩,既有专业性的培训和实践活动,也有许多趣味性的社交活动,让人收获颇丰,增强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积极性。

“为人民”是政治文明。上行下效,上面“崇德”,下面“向善”。公务人员为人民办好事办得贴心,会促进全社会的文明。中国公民犯罪率低,举世公认。文明程度高,是中国创新城市的一大特色。

延长产假问题,适度延长有利于提高社会生育积极性,但过度延长有可能加重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就业歧视,迫使女性就业中断或转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因此,优化现有制度,既要关注已有良效的增量情况,更要警惕防范新的福利损失的产生。值得注意的议题还包括:加大男性陪产假推行力度时要逐步规范其制度安排、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时要加强其相关医疗报销和生育津贴申请的即时性和便利度等。第二,基于新的发展状态、新的福利需求适时增加生育环节的支持和服务。比如,建议加快在全国范围内将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纳入医保范围。

探索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生育福利制度体系。建议加快推动实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父母育儿假制度;全面评估家庭育儿的社会价值和劳动价值,建立健全家庭育儿补贴制度;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负担,加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和子女养育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模式;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等。

全人群覆盖,系统谋划与精准施策并行

从长远来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不仅事关育龄人群的民生保障问题,更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密切相关。努力消除各种妨碍生育率回升的障碍,尤其需要根据不同年龄、职业、收入等人群的需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创新型城市和创新人才相互赋能

我们常讲“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笔者认为,二者重在“新、高”二字。“新质”“高质”要靠“新智”。成吉思汗跑遍欧亚,遗憾的是他连火车都没见过。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博大精深,高瞻远瞩,今天还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但不能不承认有部分观点已经过时。“新智”要靠新科技。在“向新而飞”的今天,我们在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过程中要重视科技的作用,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的更新。而要发展科技就要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

德国柏林郊区有个达勒姆村,号称村里出了14位诺奖获得者,是单位土地面积中获诺奖最多的。爱因斯坦有好多国籍,好几个地方都可以把他的贡献揽过去,但他获诺奖时吃住、工作都在达勒姆村。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普朗克获诺奖时也是吃住、工作在这个村。这个村怎么会出这么多名人?因为“威廉皇帝学会”设在这个村,柏林自由大学设在这个村。这家学会,这所大学、这个村共同为科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是让科学家专心致志,衣食无忧。二是同心协力,在那个年代他们已实行了不叫“产学研结合”的“产学研结合”,实业家、基金会会支持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达勒姆村的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城市是人口和资源高度集中的地区。今天,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更有效地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提高单位面积的GDP的同时,提高单位面积的人才数量?

最后,笔者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想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我们正不断创新量子信息、脑机接口、基因图谱、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并通过AI技术加速传统行业转型,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那么,将来在地球上人满为患时,这些新技术会不会帮我们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去建一座创新型城市呢?



专家简介: 邓伟志,1938年生,安徽萧县人,研究员、编审,上海大学终身教授,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

以生育保险为例。随着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2022年7月,17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作为一项为生育活动提供补偿与福利的制度保障,它应该面向所有育龄女性。因此,建议进一步放开与就业相挂钩的参保限制,改革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为覆盖所有母亲角色的“生育福利”,并以个人参保和生育行为作为保险待遇计发依据。目前,我省已将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并享受生育医疗费和生育津贴的待遇,明确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费率以及合并征收规定。还在全国创新性规定女方因失业、失业、灵活就业以及其他非应保未保原因未能享受产假和生育津贴待遇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给予适当经济补助。

值得一提的是,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而从低生育水平回升到更可持续水平,通常会遇到诸多难点和堵点。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多样且复杂,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工作涉及面很广,这就要求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时要具有系统观念,按照全局性和综合性的要求拓展工作思路的深度和工作领域的广度,并在实施中注重提高系统性、协同性和实效性。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社科论衡

■ 胡湛 袁晶

近年来,数字游民现象引人注目。所谓数字游民,是指那些利用互联网获取在线工作机会,借助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收入和生活成本差异,轻松地在工作 and 旅行之间自由切换的人群。这些青年轻装简行,依托数字技术,打破地理藩篱,实现灵活办公,并利用这种自由来探索世界。

根据某海外市场研究公司2024年10月发布的数据,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超过4000万人,近一半数字游民年龄在30至39岁之间,超过1/3的年收入在5万至10万美元之间,90%的人完成了高等教育。世界青年学生教育旅游联盟的数据显示,到2030年,数字游民数量预计将达到6000万。在浙江湖州安吉的DNA数字游民公社,就汇聚了上千名插画师、程序员、设计师等,生动展现了这一就业形态的生命力。

数字游民现象的出现,折射出青年对传统工作价值的深刻反思。数字游民脱离了朝九晚五、办公室隔挡和令人疲惫的通勤,拥有地理位置上的自由和时间自由,实现了工作形式的灵活性和个人发展的自由,有的甚至是一边度假一边工作,这完全是换了种“活法”。这体现出当代青年更追求工作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义感,渴望工作与生活的共生共生。另据统计,数字游民在安吉的平均停留时间已达58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正在实现从“游民”到“牧民”的悄然转型。“游”或有被动漂泊之感,“牧”则蕴含主动选择与深耕之意。“牧民”姿态的确立,也标志着这部分青年正主动建构理想生活转变。技术进步赋予他们摆脱地域束缚的能力,让其可以自由地选择并扎根于“心之所向”的精神家园。他们在江南古镇经营辐射全球的文创品牌,在故乡小城用代码服务国际客户……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日益模糊,有机融合成为新常态,这些青年正精心培育着契合个人志趣与价值观的新工作生活样态。

这种价值重构,是对传统单一成功叙事的超越。传统中国社会,要求青年通过个体的努力实现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向上流动;改革开放后,在工业资本主义逻辑下,通过专业知识和勤奋工作实现职业进阶成为主流。而当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不再将人生价值局限于“向上流动”的单一轨道,更渴望在“系统”之外,活出自我定义的人生意义——“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可以说,选择做数字游民不等于选择不奋斗,而是要想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奋斗节奏。

青年对工作的重新定义,是时代变革最敏锐的注脚,更是对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的迫切呼唤。当工作的内涵与外延被持续拓宽,传统以固定场所、工时、单一雇佣关系为基石的制度框架,已难以适配灵活、多元、跨地域的新型就业形态。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前瞻性眼光和系统性思维,加快构建适应数字时代、服务青年发展的新型制度体系。在劳动关系界定上,亟须探索适配灵活就业特征的认定新标准;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需更大力度破解跨地域、多平台、间歇性工作者的参保、转移接续难题,织密织牢流动中的“安全网”。劳动法规需与时俱进,清晰界定新型权责边界,切实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城市治理需突破传统地域思维,积极打造“数字游牧友好型”生态。更多提供便捷共享的办公空间、高速稳定的网络、多元化的短期居住选择及富有活力的社群连接,吸引并留住全球流动的数字人才,激发城市创新活力。

数字游民现象的出现,深刻反映了就业形态的时代之变,青年一代正在实践重新定义“何以为业”。他们在数字旷野中“放牧”理想的身影,不仅勾勒着工作与生活深度融合的未来图景,更预示着职业形态、雇佣方式乃至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理解、尊重并积极回应青年对工作价值和意义的新追求,不仅关乎青年发展,更关乎创新活力、人才竞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制度与政策体系唯有主动拥抱变革,与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方能真正为每一个渴望扎根、追求价值的灵魂,提供丰沃的土壤与广阔的天地。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和共同富裕示范区,更应率先探索、形成示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创新的制度、更包容的环境,成为新时代青年“数字牧歌”的理想家园,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生动样本。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之江青年论坛

舆论须引导,舆情要应对

■ 马俊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在互联网深度介入、影响、改变我们生活的当下,“舆论”和“舆情”这两个词汇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和讨论,社会各界亦对此展开了各种相关研究。笔者认为,舆论是抽象的,舆情是具体的;舆论是宏观的,舆情是微观的;舆论是须引导的,舆情是要应对的。在“舆论”和“舆情”后分别加上“观”“关”二字,会更有助于对舆论的早识别、早预警,对舆情的早发现、早处置。

舆论观的“观”,是观念、是观点。一是观念,舆论观的“观”和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的“观”一样,是理念和态度,是宏观的态势,我们要坚定主流舆论观、正确舆论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重中之重来抓”,为我们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党政干部,尤其是宣传干部要树立舆论观,深刻理解“舆之大者”,增强新闻舆论工作素养,提高舆论引导工作能力,时刻察觉风险、识别风险、感知风险、研判风险。二是观点,舆论观的“观”也是我们对其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党政干部也是舆论的参与者、构建者、引领者,也会深刻影响社会舆论、公众舆论和舆论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就是要求我们加强和创新网上内容建设,做大做强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提振精气神。如果我们只“爱惜羽毛”,只当“开明绅士”,不敢亮剑观感,不参与舆论斗争,舆论空间就会“乌烟瘴气”,舆论生态只会“越来越糟”。我们要预警风险,廓清谬误,澄清事实,让主流的意见和声音响彻网络舆论。

舆论关的“关”,是守关,更是过

何以为业，数字游民提出的时代之问

(作者为中共龙游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